

圖書文獻叢刊

鄭樵生著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

福建道興化府莆田縣仁德里住人俞良甫於
日本嵯峨寓居瀛海百已斯物異概流行

歲次甲子孟夏四月日

謹題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鄭樸生著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

——以日本禪僧爲主者——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

著者：鄭 樞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號四號
郵政劃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〇二)三五一一〇二八號

實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45.

序

鄭君樑生，臺灣楊梅人，幼時受殖民地教育，光復後就讀於台北師範，畢業後執教於中、小學達十六年，鄭君以好學不倦，有志研究，復負笈東瀛，專攻史學，經多年之努力，卒獲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近年來出版其研究專著多種，類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推崇。

在鄭君出版之著作中，「明史日本傳正補」一書徵引中、日、韓、琉文獻史料達一千二百餘種，考覈精審，資料豐富，榮獲七十年中正學術著作獎。另書「明代中日關係研究」，闡述明代中、日兩國關係，極具創見，該書除在國內發行之外，並在日、韓、琉發行日文版，佳評如潮，被譽為同類著作中之翹楚。其他文史譯著為「宋代文官俸給制度」，「清代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中國文學思想史」，「司馬遷的世界」，「史記的故事」等不下十餘種，出版後均風行一時。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一文，旨在為元明時代之東傳文獻目錄作一探討。全文對於元明時代之中日交通，當時日本研究漢學之風潮，日本禪林文學之盛況，中國禪學內典外

典之東傳及其影響，前因後果，剖析入微。至於所列目錄，更集今所能見之當時佛敎經論章疏，以及經史子集之所有書目，條列詳實，典據有徵，由此可見中華文化遠播東瀛之盛況。

鄭君澹泊名利，爲人誠篤，其治學之嚴謹，一如其人，現服務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負責日韓文資料室，經多年來之蒐集整理，始奠定今日之規模。鄭君公餘曾在大學中擔任日本文史課程之講授，循循善誘，爲學子所稱道。茲值其新著出版，欽敬之餘，謹綴數言，斯以爲序。

王振鵠 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前言

日本明治以前之歷史，可說明一部漢化的歷史，其於文學而言，自不例外。在日本漢文學史的三僧高峰——平安時代（七九四——一八五）的宮廷文學，鎌倉（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室町（一三三六——一五七三）時代的五山禪林文學，及江戸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以一般漢學家爲主的儒林文學，其中以禪林文學漢化程度最深，而成就也最凸出。此期之禪林高僧如虎關師鍊、義堂周信、雪村友梅、中巖圓月、絕海中津等人所寫之散文、詩詞及日記手札，其文章之純淨，造句謀篇之型式與當時元明文學相埒，相較之下毫不遜色。直可說是中國文學在日本開放的一朵奇葩。深究其原因，誠與當時禪學內典、外典的東傳有密切之關係。本文嘗試就今所得知之書目追溯當時典籍東渡盛況之一斑。雖然，本文所舉書目，可能只佔當時東渡書籍極小部分，然據此亦可推知當時日本研究漢學之趨勢與研究方向轉變之關鍵。

此外，今日國內有許多久已散佚之典籍，却緣於當時東傳日本，且受到日人之喜愛、重

視、翻刻而得以保存至今，清末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志及古逸叢書本之刊行，可爲此事作一見證，真可說是「禮失而求諸野」，這也許是當時東傳時所意想不到，令人訝異的另一結果吧！

近世日本之漢學研究風氣雖不若往日之盛況，且研究之範圍取向不免偏狹，卻因爲有大量古籍資料可供參考，遂使從事某一專精問題之學者專家，有獨到之見解與不可磨滅之貢獻。此一現象，亦屬當時典籍東傳之又一意外。

因五山文學之著作繁多，短期間無法一一過目，且曩昔典籍東傳、人物刻工之赴日，盛況亦不可再，故只能就資料誌存所及作一敘述，卦一漏萬，在所難免。敬希博雅君子，不吝賜正。

又，師大莊耀郎，臺大張仁煦兩位先生在百忙中爲我校對，內子李雙妹女士於教學、家務、課子之餘爲我謄稿，以及文史哲出版社社長彭正雄先生慨允將此稿付梓，謹在此一併致謝。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鄭 樑 生 識於臺北南海學園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 目次

——以日本禪僧爲中心——

序	一
前言	一
第一章 序 論	一
第一節 明代以前的中日交通	一
第二節 元明時代日本研究漢學的風潮	一四
第二章 禪林文學在日本	二五
第一節 中國禪林文學的東傳	二五
第二節 日本禪林文學發達的原因	四〇
第三章 內典的東傳	五三
第一節 經論章疏的東傳	五三
第二節 僧史僧傳的東傳	六八

第四章 外典的東傳……………九三

第一節 經史子集的東傳(一)……………九三

第二節 經史子集的東傳(二)……………一一〇

第五章 日本禪林文學對後世的影響……………一二九

第一節 禪林文學對近世儒學的影響……………一二九

第二節 禪林文學對出版事業的影響……………一四六

第六章 結 論……………一七三

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

——以日本禪僧爲中心——

第一章 序 論

第一節 明代以前的中日交通

中、日兩國，土地相鄰，僅一海之隔，且同文同種，實兄弟之邦。而兩國之交通往來，由來已久，在二千多年以前已見諸記載。周代時，倭人曾貢鬯草〔註一〕，而南倭、北倭均隸屬於燕國〔註二〕。至於方士徐福到日本之事，其詳雖猶待考證〔註三〕，而秦、漢末年，中原板蕩之際，華人東渡者甚多〔註四〕，並多在日本政府曾供要職，於經濟上、文化上，對古代日本有極大影響〔註五〕，乃不爭之事實。且日本亦自漢、魏、晉、宋、齊、梁、陳以來，屢向中國朝貢，接受中國冊封〔註六〕，在明代則成爲中華世界帝國之一員〔註七〕，這些史實載於歷代史乘，斑斑可考。

至日本之與中國有正式邦交，係從隋煬帝大業二年（六〇七），即日本推古天皇（註八）十五年，日本聖德太子（註九）以小野妹子（註一〇）爲遣隋使時開始的。隋朝立國甚短，只經兩代，不到四十年，便爲李唐所取代。當時日本十分仰慕中華文化，渴望中華文物，故仍繼續與唐室建立邦交（註一一）。在隋、唐時代，日本除派使節外，並還派留學生來華，有些留學生甚至居留中國達數十年之久（註一二）。他們事事學習中國，大量攝取中國文化，同時也聘請中國高僧前往宏揚佛教（註一三），故日本的政治、經濟、宗教、教育、藝術等，無不深受中國影響，形成日本之「唐化」運動。

五代至宋，中國與日本固無正式邦交，然僧侶與商賈，却接迹於海上（註一四）。迄至元代，元軍雖曾兩度東征（註一五），而終元之世，兩國未曾有過正式邦交，但民間往來與中國文化之東傳，則不但未曾稍歇，反而有凌越前朝之勢（註一六），更有進者，由於禪宗之東傳，對日本武士的影響甚鉅，塑造他們的武士道精神（註一七）。而民間之信仰禪宗，亦盛於此時，歷久而彌篤的。至宋明理學，朱熹之『四書集註』的東傳，遂造成日本朱子學之發達（註一八）。其次，建築、印刷、美術、工藝、醫藥、飲食之風習，亦在日本風靡，直至今日猶未稍衰（註一九）。而此期我國文學東傳的結果，則奠定其漢文學之基礎，開故出五山文學的花朵（註二〇）。

迄至明代，兩國關係更趨密切。日本自其室町幕府（註二一）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註二二）起，歷代將軍都曾接受明朝冊封，並自稱「日本國王臣源某某」，向明朝皇帝朝貢納款，而明朝亦時遣使節回報（註二三）。然因當時日本國內戰亂頻仍（註二四），群雄爭霸，民不聊生。而群雄爲伸張自己勢力，莫不謀求富國強兵，其財力較雄厚者，則與中、朝兩國貿易，貯積財富，但有時却幹海賊勾當，乃如鄭若曾『江南經略』（註二五），或章潢『圖書編』（註二六）所謂：「許貿易則爲商，禁則爲寇」之一夥，亦即：「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註二七）乃右手持算盤，左手執刀槍，如有人妨礙其右手之算盤，則伸出其左手之刀槍來（註二八），而由強行掠奪進至強行貿易的（註二九）。明廷因倭寇關係，曾發布下海通番之禁（註三〇），實施勘合制度（註三一），並限制日本的貨期、人員及船數（註三二）。雖然如此，中華文物仍大量輸往東瀛，給日本經濟上、文化上鉅大的影響，而以貨幣、美術、工藝、文學爲尤然（註三三）。就元明時代從中國輸出日本的貨物而言，固有絲綿、絲織品、銅錢、藥材、書畫、圖書、瓷器、日用雜貨等，種類繁多（註三四），但在此只論述圖書東傳情形，其餘暫且不談。

【註釋】

註 一：王充『論衡』卷第八「儒增」篇云：「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西草。」同書卷第十九「恢國」篇亦云：「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同書卷第十三「超奇」篇則云：「暢草獻於倭。」許慎『說文』釋「邕」字爲：「以秬釀鬱草，芬芳條暢，以降神也。」則邕乃我國古代祭祀用製造香酒之草名。按：「暢」與「邕」同。又，本書以「」號表示單行本，「」號表示單篇論著，以示區別。

註 二：『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南倭北倭屬燕。」

註 三：方士徐福到日本事，雖猶待考證，但日本熊野之有徐福祠，却是衆所周知之事情。請參看彭雙松『徐福研究』（民國七十三年二月 富蔭園書出版社），山本紀綱『徐福東來傳說考』（昭和五十年八月 謙光社）及『日本に生きる徐福の傳承』（昭和五十四年一月 同上）。

註 四 秦、漢人東渡日本事，日本史乘記載甚多，而宋越倫教授在其所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民國五十五年二月 正中書局）二七—二八頁，就此事作如下敘述云：「根據日本史籍，漢人從樂浪、帶方兩郡的大量移入日本三島，是在西曆三世紀的應神天皇時代，當時應神大肆造船，我在韓的遺民弓月君，（一稱融通王）於西曆二七四年，率領「百二十縣」之人民至日；弓月君自稱爲秦始皇之十三世孫，故日人稱之爲秦人。弓月君東渡之際，據傳曾遭新羅所阻，應神曾遣葛城襲津彥迎之于海上。另一漢人集團之渡日，即在應神天皇二十年（西曆二八九），由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率領，阿知使主自稱爲後漢靈帝之三世孫，故日人稱之爲漢人。根據日人之訓讀，「秦」「漢」兩音均與紡織有關，而阿知使主又

于應神天皇三十七年（西晉光熙元年，西曆三〇六年）奉派至吳（建業地方）求「女工」、「漢織」、「吳織」等紡織工人至日，可知其前後因果關係。」

註五：華人在日本政府曾供要職，於經濟上、文化上對古代日本有極大影響之說法，請參看前舉宋越倫「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三三一—六三頁。

註六：有關日本屢向中國朝貢，接受中國冊封事，見於我國正史之「倭傳」、「倭人傳」、「倭國傳」、「日本傳」、「日本國傳」。請參看鄭樵生「明史日本傳正補」（民國七十年十二月 文史哲出版社 文史哲學集成五十六）九一—一〇頁，及五五—六六頁。

註七：日本於十五世紀初臣屬中國，由明成祖冊封為日本國王，而日本也從足利義滿（一三五八—一四〇八）起，自稱「日本國王臣源」，朝貢於明的。請參看鄭樵生「明史日本傳正補」二二八—五一九頁，及「明代中日關係研究」（民國七十三年八月 文史哲出版社）一五七—一八五頁。

註八：推古天皇（五五—一六二八，第三十三代，五九二—六二八在位），敏達天皇之后。崇峻天皇為權臣蘇我馬子所弑後被擁立，而以聖德太子為攝政，定「官位十二階」，頒「十七條憲法」，編纂史書，興建法隆寺，在古代日本文化上創了飛鳥時代。其陵墓在大阪府南河內郡。

註九：聖德太子（五七四—六二二），日本用明天皇（五八五—一八七在位）第二子，母穴太部間人王。名廄戶豐聰耳皇子，諡為聖德太子。又名上宮主。其叔母推古天皇（敏達后，五九二—六二八在位）在位時為攝政，整頓內外政治。六〇三年，定「官位十二階」，明年，公布「十七條憲法」。編纂（日本）國史。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遣小野妹子來華，致力吸收中原文化，而尤盡力興隆佛教。著『三經義疏』，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留下不少業績。

註一〇：小野妹子，日本推古朝之遣隋大使，孝昭天皇之後。『隋書』「倭國傳」紀其名爲蘇因高。累官至大禮。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七月三日，聖德太子爲求佛法及移植中國文化，乃命小野使華，此爲中日兩國政府邦交之始。翌年三月，偕隋使文林郎裴世清，副使遍光高等十三人返抵筑紫（現今福岡）。及抵京，奏請歸國途次，隋之國書爲百濟人所奪，其朝廷原欲處流刑而作罷。同年九月，裴世清一行返國時，推古又命其使華，以難波雄成副之，福利爲通事，高向玄理（？—六五四）、南淵請安、僧旻（？—六五三）等留學生，學問僧十八名同行。五年九月，完成使命，晉升爲大德冠。相傳小野爲日本池坊流插花之始祖云。

註一一：自西元六三〇年至八九四年之間，日本大和朝廷曾任命遣唐使十八次而實際來華十五次（第十二、十三、十八次未啓程）。其使節以輸入中國之典章制度及文物爲目的。成員有大使、副使、留學僧、留學生等，人數則自百人至二百五十人，有時則多達五百人。以帆船四艘渡海。航路則初沿朝鮮半島至山東半島登陸；與新羅關係惡化的八世紀，則橫渡東海至長江口附近上岸。那些留華學生、僧侶以吉備真備（六九三—七五五）、玄昉（？—七四六）、最澄（七六七—八二二）、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等最著，在政治、學術、宗教方面，對古代日本有很大貢獻。

註一二：如『龍山和尚行狀』、『中嚴圓月自歷譜』等的記載，龍山德見（眞源大照禪師）曾於元成宗大德九

年（嘉元三年，一三〇五）來華，順帝至正十年（正平五年，觀應元年，一三五〇）返日，前後共達四十六年。又據『空仙梵傳語錄』、『了庵清欲語錄』的記載，椿庭海壽會於順帝至正十年來華，明洪武五年（文中元年，應安五年，一三七二）返日，前後共達二十三年。

註二三：日本會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天平四年，七三二），遣僧榮叡、普照來華禮聘揚州大明寺的鑑真和尚（六八八—七六三）東渡傳戒。鑑真於玄宗天寶二年（天平十五年，七四三）十二月束裝赴日，經五次失敗，終於十二年抵東瀛。至其東渡過程，及他在日本的活動與影響，則請參看鄭櫟生「唐大和尚東征傳——中國佛教東傳的一幕——」（書和人 第二七〇期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三日 國語日報社），及淡海三船「唐大和上東征傳」，收錄於『中華大藏經』「遊方部」；安藤更生『鑑真』（昭和四十二年十月 吉川弘文館 人物叢書一四六）、『鑑真大和上傳の研究』（一九八〇年三月 第二版 平凡社）；藏中進『唐大和上東征傳の研究』（昭和五十一年七月 櫻楓社）；那波利貞「鑑真大和上と其の時代」（甲南大學文學界論集 第三十八號）；石田瑞磨「我が國に於ける鑑真渡來以前の戒律について」（宗教研究 第一二五號）；鷲尾順敬「鑑真和尚傳」上、中（佛教史林 第四、五號）；細川公正「鑑真の一考察」（歴史地理 第七十六卷第四號）；松井圓信「鑑真大和上年表」（叡山學報 第十八號）；橋本凝胤「鑑真和尚の東征と招提律寺」（以可留我 第十號）；小野勝年「鑑真とその周邊」（佛教藝術 第五四號）；塚本善隆「過海大師鑑真一行と日本」（同上 第六四號）等。

註一四：有關此一時期的中日兩國交通情形，請參看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民國五十四年七月 臺一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王婆楞『歷代征倭文獻考』（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 臺一版 正中書局），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昭和五年五月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秋山謙藏『日支交渉史研究』（昭和十四年四月 岩波書店），西村眞次『日本海外發展史』（昭和十七年十二月 東京堂），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昭和四十年五月 再版 富山房）等。

註一五：有關元軍東征日本事，請參看『元史』『世祖本紀』『朝鮮傳』『日本傳』『元高麗紀事』『元文類』，王婆楞『歷代征倭文獻考』，余又蓀『宋元中日關係史』（民國五十三年八月 臺灣商務印書館），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宋越倫『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民國五十五年二月 正中書局），鄭樸生『明史日本傳正補』（民國七十年十二月 文史哲出版社 文史哲學集成五十六），王民信『蒙古入侵高麗與蒙聯軍征日』，收錄於『中韓關係史研究論集』（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著作叢書之二），『高麗史』、『高麗史節要』、『八幡愚童訓』，竹長季長『蒙古襲來繪詞』，池內宏『元寇の-new研究』（昭和六年八月 東洋文庫），竹內榮喜『元寇の研究 附蒙古襲來繪詞』（昭和六年九月 雄山閣），太宰府天滿宮『太宰府小史』（昭和二十七年四月 太宰府天滿宮），龍鼎『蒙古襲來』（昭和三十四年九月 至文堂），陸上自衛隊福岡修親會『元寇——本土防衛戰史——』（昭和三十九年三月 陸上自衛隊福岡修親會），黒出俊雄『蒙古の襲來』（昭和四十四年